

广西文史资料



新桂系紀实 中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新桂系纪实

中集

广西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十辑

广西壮族自治区新闻出版局
报刊增刊批准证(90)第3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0年7月

主 编	莫乃群
副 主 编	韦瑞霖
责任编辑	覃振强
	黎志峰
	陈奕俊
审 稿 员	冯 璞
	刘铁武
	李 骏
	古村型

序

区 济 文

《新桂系纪实》是全国政协专题文史资料重点协作项目，本书的征编，得到了全国政协的具体指导，得到了安徽、湖北、湖南、广东省及武汉市政协的大力协作。我代表中共广西区政协党组、政协领导向参加协作的全国政协和各兄弟省、市政协表示感谢！向编辑出版这本新书付出辛勤劳动的全体工作人员，致以敬意！

大家知道，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黄旭初为首的“新桂系”集团，曾统治广西达25年之久，它的影响和势力涉及全中国，它长期与蒋介石集团争夺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权，最后，李宗仁竟一时取代了蒋介石成为国民政府的代总统。《新桂系纪实》比较系统地记述了新桂系在军阀混战中崛起，在1925—1927年大革命中，利用国共合作北伐战争扩充势力，北伐后在蒋桂战争中受挫重整旗鼓借抗日第二次国共合作之机复起，日本投降后与蒋介石集团策划内战，最后和国民党在大陆政权一同溃亡的全过程。这本由李、黄、白等新桂系首脑及其党政军高级干部撰写的“三亲”史料，揭露了许多深层史实，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内幕，可以说，这是一部史料内容十分丰富，可读性强的文史专辑。《新桂系纪实》的出版发行，不仅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本了解和研究中国近代史、民国史的参考书，而且，它对于促进海内

外爱国统一战线，对于积累保存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教育下一代，都将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

实事求是，忠于历史，是《新桂系纪实》这本新书的最主要特点。全书如实地反映了新桂系形成、发展、失败的全过程，它既记述了新桂系参加第一、二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史实，也叙述了新桂系反共反人民的事实。例如：1927年4月新桂系集团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在上海亲自参加了同蒋介石密谋召开的清党会议，策划“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分裂国共合作，并在蒋介石指挥下直接组织反革命武装对上海、广西等地的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实行大屠杀；中国共产党1929年12月领导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后，遭到了“新桂系”集团的军事围剿，屠杀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摧残革命根据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1936年6月1日，“新桂系”与广东陈济棠联合发动了抗日反蒋的两广事变（亦即西南事变）。6月8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名义对红色中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称赞“两广勇敢的单独来抗日并打倒南京的屈辱外交，这是值得庆幸的壮举”，指出：“西南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行动”。表示“准备在军事上及其它各方面给予西南以各种可能的援助”。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及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国民党当局出师抗日的压力下，“新桂系”集团与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矛盾有所缓和，白崇禧应蒋介石之邀，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李宗仁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广西在短期内编成第十一、第二十一两个集团军，不久又编成第十六集团军，转战于沪、苏、浙、皖、鄂、豫、湘、桂等省、市的抗日战场，抗击日本侵略者，“新桂系”部队参加了闻名中外的淞沪、台儿庄、徐州、武汉、桂南、随枣、桂柳等会战。“新桂系”集团出于团结御敌及对付蒋介石的消灭异己政策的需要，曾一度有限度地允许民主进步人士、中国共产党人在广西开展各项抗日救亡活动，广

西省会桂林一度成为大批爱国民主人士进行抗战宣传活动的主要城市，并曾获得抗战“文化城”之美誉。但在蒋介石集团掀起反共高潮以后，“新桂系”集团也参加了对共产党人的迫害活动，对人民武装进行挑衅，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也被强行撤销了。这是由于新桂系与蒋介石集团都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不同的是蒋介石集团属占据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统治权，新桂系集团属地方实力派。但他们在抗日战争中都对共产党采取反革命两面政策。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危及他们阶级利益时，不得不与共产党合作抗战，而当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采取诱降政策时，他们又都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消极抗战，对共产党实行溶共、限共、灭共的反动政策以及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民主根据地，妄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力量。

抗日战争初期，国民政府决定战区司令长官兼任一个省的主席，以利军政合作抗战。1938年初，李宗仁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其后，因“新桂系”军队驻安徽省境内，廖磊、李品仙、夏威、张义纯相继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新桂系”统治安徽省长达十二年。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动内战，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长，李宗仁任北平行营主任（后为行辕），参与了蒋介石策划的反动内战。1948年国民党统治区内竞选国民政府第一届总统、副总统，李宗仁置蒋介石的反对于不顾，参加副总统竞选，最后得的选票超过了蒋介石全力支持的对手而当选，蒋介石与“新桂系”集团的矛盾又加剧了。蒋免去白崇禧的国防部长职务，任白为“华中剿匪”总司令，将白挤出南京。淮海战役后，“新桂系”集团一方面加紧了与美国的勾结，寻求美国的支持；一方面由白崇禧出面，以蒋介石妨碍和平解决国共两党争端为由，通电逼蒋下野。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声明，提出八项条件作为国共两党和谈基础。蒋介石见大势已去，才于1949年1月21日宣告“引退”，由李宗仁代理总统。“新桂系”集团长期与蒋介

石集团争夺国民政府的统治权形式上是如愿以偿了。

李宗仁代理总统后，拒绝在和谈协议书上签字，国共和谈破裂。白崇禧除在华中一带推行其“总体战”积极备战外，还在广西组成十多个“总体战督导团”，到各地强令推行其总体战的“一甲一兵一枪”的反动措施，妄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江南广大地区。衡宝战役，“新桂系”集团的主力第七军被歼，人民解放军乘胜分路挥师入桂，在桂境内迅速消灭了“新桂系”集团的部队以及从湖南退入广西的其它国民党军队共五个兵团（含地方武装）17万余人（约一万余人逃往国外不计在内）。1949年11月20日，“新桂系”集团首领李宗仁离邕飞抵香港，后赴美国；12月3日，白崇禧、李品仙、黄旭初等首要人物分别离开南宁飞抵海口。12月11日，广西全境解放。不久新桂系残余势力在广西各地到处暴乱，一九五〇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又消灭了新桂系集团残余势力三十七万多人。“新桂系”集团至此彻底覆没。

李宗仁在美国避居16年之后，于1965年7月，响应祖国号召，冲破重重阻力，返回祖国大陆。1963年，李宗仁先生曾对《欧洲周报》记者说：“我由于自己的失败而高兴，因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正在诞生”，表达了他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感情。1969年1月，李宗仁于弥留之际，在写给毛主席、周总理的信中说：“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条路是走对了的。”他对回归祖国其所以至死不渝，是因为这是他一生无数经验教训的总结。这一总结，也为至今仍留在海外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有关人士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祖国要统一，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我们殷切希望仍在海外的原在“新桂系”集团工作的人士及其亲属，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携手合作。

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全国政协前主席周恩来同志于1959年倡导开展起来的，三十年来，文史资料工作载入人民政协章程，被列为各级政协的重要任务，它已经发展成为我国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是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在自治区党委和历届政协领导的关怀指导下，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绩。通过文史资料的征集出版，对于帮助人们了解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了解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救亡图存的奋斗，了解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道理，起了很好的作用。《新桂系纪实》这本书，对于我们了解借鉴中国近代史，将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

（作者系中共广西区政协党组书记、政协副主席）

目 录

中 集

1937年——1945年的新桂系

第一章 新桂系在广西的统治与抗战

王公度案内幕	程思远	(1)
广西建设研究会的成立和结束	陈劭先	(11)
抗战期间广西征工协筑湘桂铁路纪述	叶鸣平	(21)
抗战期间广西征工协筑黔桂铁路纪述	叶鸣平	(33)
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的矛盾	倪仲涛	(41)
回忆广西学生军	靳为霖	(49)
“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的回顾	汤有雁	(73)
杨东莼主办的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	陈宪章	(93)
桂南会战	白崇禧	(101)
抗日战争中的桂南战役	黄炳钿	(107)
昆仑关攻坚战亲历记	郑洞国 郑庭笈	(111)
我所知道的桂林逸仙中学“七·九”事件经过	罗筱坤	(119)
抗日战争初期新桂系对共产党人的迫害	陈大文	(122)
抗战期间广西金融片断	龙一飞	(125)
桂柳会战	白崇禧	(131)

一九四四年桂林防守战	郭炳祺	(135)
南宁两次沦陷纪实	邓维莊	(141)
抗战末期李济深在桂南的活动与梁朝玑诱杀张炎		
桂柳反攻作战	陈 雄	(148)
	白崇禧	(151)

第二章 新桂系在第五战区

第五战区初期防御战	李宗仁	(155)
抗战初期第二十一集团军在沪、浙、皖战场		
台儿庄之战	蓝香山	(157)
徐州会战	李宗仁	(170)
一九三八年寿县战况的回忆	刘清凡	(195)
第三十一军临淮关、定远之战与田家庵、九龙岗之防守		
蒙城抗战记	凌云上	(204)
武汉会战	白崇禧	(216)
黄广会战概况和第八十四军的作战经过	凌压西	(226)
随枣第一次会战	凌压西	(233)
随枣第二次会战始末	凌压西	(240)
蒋、桂在第五战区军队政工方面的明争暗斗		
我所知道的大别山惨案	刘立道	(266)
我所知道的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	韦瑞霖	(270)
抗战初期在第五战区内所办的一些临时训练机构		
豫、鄂、皖边区党政军工作人员训练班概要	廖富荪	(276)
	朱厚祁	(282)

第三章 新桂系在安徽

新桂系统治安徽概述	张义纯 (289)
新桂系统治安徽初期的片断回忆	陈良佐 (304)
新桂系举办的安徽省政治军事干部训练班	
.....	吕祖杰 (317)
抗战初期我在安徽的一段经历	章乃器 (324)
抗战初期的安徽财政	许汉三 (331)
新桂系统治下的安徽粮政	苏 民 (338)
“安徽省货检处”和“立煌企业公司”	吴怀民 (345)
突击安庆日军的一次战斗	滕唯平 (351)
第二十一集团军在安徽	李盛宗 (352)
皖东磨擦亲历记	林乃源 (385)
抗日时期的皖东及皖东惨案	曹茂琮 (363)
新桂系在皖东的部队与日伪勾结二三事	
.....	伍焕嵩 (371)
新桂系在安徽的一些政治措施及其与C·C的斗争	
.....	刘立道 (376)
日军窜犯大别山与立煌沦陷	刘立道 (393)
盗掘楚王墓亲历记	邓峙 (404)
新桂系安徽省政府南逃和被歼的前前后后	
.....	田世庆 (408)

第四章 白崇禧在国民政府

白崇禧在国民政府活动片断	邓达之 (413)
白崇禧当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	何作柏 (414)
白崇禧在军训部和校阅委员会	蓝香山 (423)

王公度案内幕

程思远

王公度是广西永福县人。一九二〇年在广西法专毕业后，因避旧桂系陆（荣廷）、沈（鸿英）之战寄居上海，通过其永福小同乡韦永成的介绍，与李宗仁的三弟李宗义（李宗义妻是韦堂姐秀英）认识。宗义和公度均爱好京剧，后者尤擅京胡，有时在客前自拉自唱，意兴甚豪。以此李、王时相过从，来往密切。

一九二六年两广统一后，国民党军、政要人为适应国共合作的新形势，多保送子弟赴苏联留学。因此，王公度、李宗义、韦永成等三人也得到李宗仁的资助，到莫斯科入中山大学深造。据王新衡说：“我知道王在俄时决不是共产党，他在学校时是最不用功的学生，天天下棋，拉拉胡琴，翻翻中国线装书，有些名士派”①。

一九三〇年夏，李宗仁联合冯玉祥、阎锡山反蒋，爆发了中原大战。李宗仁从广西出动全部兵力入湘，企图与冯、阎会师武汉。那时我在李宗仁的总部当科长，王公度任总部秘书，我有时向李宗仁汇报工作，因此与王公度认识。我看到其人生得中等圆胖身材，配着一个蛋形的脸，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沉默寡言，喜怒不形于色，是一个具有军师素质的典型人物。

一九三〇年六月后，桂军在湖南受挫，退回广西。李宗仁与白崇禧仍要“苦挣待变”，因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青年团”，

① 丁中江《广西王公度被杀的前因后果》，

• 作者当时系第四集团军总部科长。

以王公度为书记，我为助理书记，这是我与王公度共事之始。当时我们两人对外都是秘书，但做的却是这个组织的秘密工作。

一九三二年蒋、汪合作，分主军、政。李宗仁联合广东陈济棠，以胡汉民为靠山，利用广州“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实行武力割据，与南京政府对立。李宗仁为了稳定陈济棠的反蒋立场，长期住在广州百子路孖棚岗。广西军、政事务全由白崇禧个人主持，并得便宜行事。

那时王公度很受白崇禧重用，他一身兼任第四集团军（广西部队恢复武汉时代的旧番号）总政训处处长、南宁军校政训处处长、广西省党部常务委员、广西省政府委员、广西党政研究所训育主任、童军训练所教育长。集中组织、政工、青训大权，红极一时，其地位仅次于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成为广西第四号人物。

回顾一九三一年二月底，蒋介石扣留胡汉民时，陈济棠即在古应芬策动下向广西伸出合作之手，李宗仁先派王公度前往广州报聘，商谈岭南组府反蒋事宜。其后王公度即乘此机会前往香港、上海一行，分别在港、沪设置情报机构，收集南京情报，提供李、白参考。白崇禧下条子给总部经理处按月特支给我大笔款项，由我收到后即交给王公度；王公度所收集的情报，也是由我转递白崇禧“亲启”。正因为如此，以前是“军统”要角，现在是蒋经国心腹的王新衡说：“中央特工人员一直把王当作眼中钉，要去之而后快。”

另外，王公度延揽了很多留俄同学到南宁军校（校长是白崇禧）工作，其中谢苍生是政训副处长，李一尘、曾希颖、陆一远、张威遵、区渭文等担任政治教官。王公度还把军校第五、第六两期的学生成立同学会，组织通讯社。王公度通过这些组织，要分发到部队的军校毕业生，将其机关及部队内部情况随时向他密报，而他则转给白崇禧。王的这些作法，深得白崇禧的欢心，

但广西边防对讯督办李品仙、第七军军长廖磊、第十五军军长夏威均恨入骨。

一九三三年下半年，白崇禧一次对我说：“王公度主管的单位太多，他的精神兼顾不来。例如张定璠介绍万民一、万仲文、刘士衡、胡讷生、徐梗生、朱午建等六人来广西做宣传工作，我交给王公度任用，他长期不予位置，使他们闲住在中山酒店里，嚷着要回上海去，你去对他说，他今后只能专做军校政治工作，将总部政训处长一职让给潘宜之担任。”原来潘宜之已经从伦敦回来了，他是一九三〇年北平“扩大会议”失败后去英国的。

我把白崇禧上面的话向王公度传达时，只见他面色大变，满头大汗，显然这事对他太突然了，事前没有精神准备。他等我说完，就脱口而出道：“我亲自去见白老总。”跟着匆匆而去。次日王公度对我说：“我已经对白老总说清楚了总政训处仍由我负责。”十分清楚，他舍不得丢这块肥肉。事后证明，他犯了错误，没有自知之明。

一九三四年在我赴欧留学之前，李宗仁从广州回来，将那个秘密组织改组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实行分工制：以王公度为组织训练委员会主任，潘宜之为宣传委员会主任，邱昌渭为秘书部主任，黄旭初为政治委员会主任。不仅如此，在我到欧洲不久，他终被迫辞去总政训处长，由潘宜之继任。这表明王公度在李、白一手包办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陈济棠发动的“两广事变”，陈济棠很快失败了。蒋介石要乘机解决广西问题。李、白不甘示弱，决定抵抗。八月二十四日，在南宁总部召开一个各党派、各团体代表的联席会议上，王公度和胡鄂公一样，主张在广西开府反蒋。
①而李、白因参谋总长程潜已于八月二十日衔蒋之命派唐星来南宁谈判，和议尚未绝望，未予积极支持。

①刘斐：《两广“六一”事变》

九月二日，蒋介石派居正、程潜、朱培德为代表到南宁商谈和平。三日晚上，李宗仁召集白崇禧、黄旭初、潘宜之、王公度、李任仁在广西政府大楼举行会议，讨论和战问题。会上王公度仍主张团结进步党派，在南宁另创新局，直到深夜，未有结论。四日上午继续讨论。李宗仁说：“‘六一运动’（按：即“两广事变”）以来，虽与各方面有密切联系，但只有救国会（杨东莼代表）寄予精神上的支持；张学良尽管坚决抗日，但倒蒋未必参加，刘湘则始终不肯一同露面。在上述情况下，广西独力支撑，财政断难持久。如果蒋答应抗日，而又维持广西现状，应以和为上策。”于是拟订了九条和议方案。于九月四日下午一时派刘斐偕居、程、朱三人飞粤见蒋，蒋、桂对立就这样妥协了。显而易见，蒋、桂妥协是王公度极不惬意其出现的一种局面。

一九三七年五月间，周恩来副主席偕张云逸同志从延安到西安（见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大事记）。七月六日张云逸偕秘书李实（即罗理实，“文化大革命”前任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秘书长）到桂林访问李宗仁。张氏此行，是通过刘仲容居中联系，由王公度周密安排的。

一九六六年春，罗理实在广州对我提到当年去桂林的经过时说：他与张云逸到香港后，即接到王公度通知，要他们乘港梧轮船去梧州，到时由梧州公安局长李一尘接待。李一尘原系王公度的留俄同学，一向在南宁军校当政治教官，并不是做公安局长的材料。十分清楚，他此时在梧任职，纯为适应对外联系的需要。后来张、李两人由李一尘负责派车送去桂林，刘仲容奉派在荔浦汽车总站迎候。

李宗仁对张云逸此次访桂，十分重视。据黄旭初一九三七年日记所述，从七月四日起，李宗仁即约白崇禧、黄旭初、李任仁、李品仙、王公度、甘介侯、黄同仇、潘宜之举行会谈，商量决策。讨论到深夜，“未得具体结论”。次日继续商议，争论颇为激烈。以王公度、李任仁为一方，认为广西与中共均主张：（一）抗

日，（二）民主政治，（三）社会主义，应当加强联系，通力合作；但黄同仇、潘宜之、黄旭初等人则以为广西应建立自己的政治思想，不能抄袭共产党的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这是政治家应有的态度。倘以学者态度来搞政治，必然失败。^①这就证明新桂系内部有进步和保守两派之争。其中尤以王公度与潘宜之对抗最烈。

徐亮之（即徐梗生）在《亮斋随笔》中说：“诸将以李、白右公度，敢怒而不敢言，外客稍稍敢言者，亦惟潘宜之一人而已。”^②这证明潘宜之常于李宗仁、白崇禧面前说王公度的坏话。事有凑巧，一九三七年六月三十日，国民党财政部长宋子文（孔祥熙因访英，由宋继任）到桂林，商谈蒋、桂妥协以后，广西银行的桂钞（毫洋票）与中央银行的法币比值问题。潘宜之代表李、白同宋谈判。宋似乎受到指示，对桂系十分慷慨，答应以二比一的比率收回桂钞，即桂钞一元等于法币五角。这就无异帮了广西的大忙，以致潘宜之也不得不感激涕零地说：“你这样帮忙广西，将来怎样对蒋先生解释呢？”^③其中有无交换条件，吾人不得而知。但看到后来潘宜之那样热心于搞掉王公度，似乎新桂系炮制王公度案，中了南京政府的反间计了。

一九三七年八月四日，白崇禧应蒋介石之邀从桂林飞南京，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不久王公度也从香港抵南京。

时黄旭初、夏威在庐山训练团受训，事毕去南京见白崇禧。对此，黄旭初在八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健公对余云，思想纠纷问题，囑回报德公，早日处置。特使王公度随同回桂，免其他适。今日德公约予及鹤龄（李品仙）、煦苍（夏威）讨论此事，经年悬案，现在始获初步决定。”这就说明王公度案的发

^①黄旭初1937年7月5日日记。

^②徐亮之：《亮斋随笔》第54页，香港自由出版社出版。

^③黄旭初1937年6月30日日记。

生，有外因也有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外因是，王公度的问题，肯定是蒋介石对白崇禧提出的。因为一九四七年，蒋对白也提出了刘仲容的问题。无风不起浪，白断然不是凭灵机一动提出这个问题的。

内因是王公度的问题是“经年悬案”。这就意味着在“两广事变”发生时，这个问题就已经存在了。现在整整有一年了。

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日，王公度被逮捕。黄旭初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一年以来，省内思想纷歧，史派、托派到处活动，在学校中时搞风潮，最近方发觉其组织，今日德公（即李宗仁）将王公度、谭裕看管，并电南宁将谢苍生、韦干等扣留讯办”，同时“检查王公度的行李，有《目前工作计划大纲》，赫然王公度欲为首领，企图破坏团体（注：此处所谓“团体”，不是新桂系，而是那个“革命同志会”，因为“团体”是该会的代字）。该文件之字迹，极似何作柏（注：王公度的秘书）手笔，讯之果然，因即扣留。”

协助黄旭初“勘理王案”的徐亮之①，在《亮斋随笔》中对本案的记述与黄旭初的说法不同。徐文说：“桂往有王公度、谢苍生之狱，其时皆以王、谢归‘托派’，欲因抗日酿桂乱，实非也。王、谢之死，其远因，开罪军人，排摈外客，二语足以尽之。其近因，则坐订所谓《政治纲领》，有‘前方争取地位，后方联络中共’二语故。”

徐亮之在海外一度住在我的隔壁，他同我谈到王案时郑重地对我说：“所谓王公度是‘托派’完全是假的。当王公度处死后，立刻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对外要怎样解释呢？就是说要加给他什么罪名呢？对此，李宗仁绕室彷徨，一筹莫展。我因建议道：‘何不给王公度扣上托派的帽子？’德公纳议，遂定案。”这就是说“托派”一词是徐想出来的。后人以讹传讹，遂使王案

①徐亮之即徐梗生，那时是“革命同志会”秘书部副主任。